

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为什么研究日常生活史

李小东

【提要】 讨论“为什么研究日常生活史”，有助于从研究动机层面梳理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内在理路。在反思二战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现代性悖论的基础上，西方学界出现了以法国哲学、社会学界的“日常生活批判”，以及德国史学界的“日常生活史”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研究。由于理论关怀的不同，西方史学界新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有较大区别。21世纪初，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经译介进入中国大陆，其“以人为核心”“总体史”的研究取向，因应了国内史学研究克服“泛文化”“碎片化”倾向的需要。当下中国日常生活正经历深刻变革，大众有从历史层面思考日常生活意义的需求，同时中国史学研究范式也有更新的内在需要，故此有必要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

【关键词】 日常生活史 日常生活 研究动机

近年来，日常生活史被视作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日常生活史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革命之后，与21世纪初新文化史革命相辅相成的又一史学潮流。^① 具体而言，日常生活史被认为能够超越传统社会史，特别是社会生活史“见物不见人”、单纯关注社会结构而忽视生活世界的问题。

粗略地看，目前可以被归入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成果，大致存在着两种基本取向，一种情况是在研究题目上冠以“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等字样，但在论述过程中，并不把日常生活史作为一个自觉的研究范式；另一种情况则相反，在论述开篇，先给定日常生活史的具体内涵和外延，并沿着基本给定的理路展开讨论。

仅就第二种取向而言，由于不同研究者对于日常生活史的定义各有不同，虽然大致趋向一个宽泛的路径方向，譬如关注生活、关注民众、文化阐释的方法，等等，但具体什么是日常生活史，如何研究日常生活史，目前在学界却有着相当的争论。这些争论，正源自讨论日常生活史理论时的问题意识，大多是“何为日常生活史”“如何研究日常生活史”等对象、方法层面的问题。然而，对于“为什么研究日常生活史”这一动机层面的问题，却有待进一步着墨。^②

① 实际上，新文化史在西方学界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日常生活史之后的史学思潮，参见 Paul Steege, Andrew Stuart Bergerson, Maureen Healy and Pamela E. Swett,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A Second Chapter”,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80, No. 2, 2008, p. 358.

② 有关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综述，代表性的有胡悦晗、谢永栋《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史林》2010年第5期；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常建华《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常建华《他山之石：国外和台湾地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启示》，《安徽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李金铮《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王善军《辽宋西夏金元日常生活史研究概述》，《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7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余新忠、郝晓丽《在具象而个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闫爱民《20世纪以来的秦汉日常生活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5期；李俊领《日常生活：社会史研究的对象、视角与跨学科对话》，《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夏炎《范式引导与记忆整合：魏晋南北朝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朱彦民《先秦社会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王力平《隋唐五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0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借用刑侦学的思路来看,把握一个案件最重要的是摸清案发的动机,紧随其后的具体过程,往往由动机生发出来。单纯探究案件细节,很有可能将案件本身脱离出案发情境,形成对案件的孤立认识。而探究案发动机,往往能够找出多个案件之间的逻辑关联,有助于并案侦破。这一思路,在廓清日常生活史研究范式上,有其可取之处:仅从研究对象、方法的关注生活、关注民众、文化史阐释方法等特点入手,很容易出现刻意嵌套对象、方法,而基本问题意识却大相径庭的情况,以至于看似内容、方法大致不差,但研究旨趣并不同道。

故此,对于日常生活史范式的讨论,有必要在以往“何为日常生活史”“如何研究日常生活史”等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为什么研究日常生活史”这一动机性问题。从诞生日常生活史的具体情境、后世史家讨论日常生活史的理论诉求、当下讨论日常生活史的社会背景等层面,为日常生活史研究理论提供一个学术史层面的关照。此外,应当看到,由于内含“日常生活”这一哲学、社会学命题,有必要把日常生活史研究放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史学的问题脉络之中,则日常生活史究竟有怎样的学术抱负,其与诸如新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范式,究竟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也更有可能被揭示出来。

一、理论缘起: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与法德的战后反思

(一) 英法德语中“日常生活”一词的文化内涵

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观点是,西方史学界“日常生活史”范式的出现与哲学、社会学界“日常生活”研究的兴起之间有内在逻辑关联。

沈松桥关注到英语中“everyday life”与“daily life”的语义区别,指出 everyday life 更多是指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生活的特殊经验,而 daily life 则主要指的是前近代农村社会经济所形塑出的生活状态。^① 这一观点,基本上沿用了吉登斯对这两个词的界定。但是,后者的表述带有更多源于自身体验的情感成分。吉登斯认为, everyday life 是“现代社会的单调乏味的机器般的有节奏的日常生活”, daily life 是“古代社会的充满着具体而丰富的意味的每日生活”。^② 对比吉登斯和沈松桥的定义,在具体所指上并无出入,但在叙述方式上,吉登斯显然有其感情倾向: everyday life 更加机械、无趣, daily life 则趣味盎然。

本·海默尔的视角更加宏阔,其著作讨论了西方文化中通行的“日常生活”概念的不同表述形式,包括英语中的 everyday life 和 run-of-the-mill,德语中的 alltagsleben 和法语中的 la vie quotidienne。^③ 海默尔将 run-of-the-mill 视作 everyday life 的同义词,正呼应了吉登斯对 everyday life 所蕴含的工业社会中,尤其是流水线生产方式大规模推行后,城市工人的劳作类机械化,以致生活本身变得枯燥乏味的认识。原本应该日日新的生活,像转个不停的磨一般陷入了死循环。在德语中,日常生活为 alltagsleben,从构词法上来说, leben 表示一种存在的状态,故而核心问题在于 alltag。alltag 在德语中,更多地指工作日。也就是说,德语 alltag 本身就带有工业社会所带来的二分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意涵。此外, alltag 一词本身也可以表示日常生活,亦即德语中“日常”与“日常生活”两

① 沈松桥《中国的一日,一日的中国——1930年代的日常生活叙事与国族想象》,《新史学》第20卷第1期,2009年3月。

② 刘怀玉《西方学界关于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现状综述》,《哲学动态》2003年第5期。

③ 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页。

词间,并无本质的区隔。在法语中,la vie quotidienne 以一个词组的形式出现,vie 表示生活,quotidienne 作为形容词表示日常。与德语相似,表示日常的 quotidienne 的名词形式 quotidien,也可以同时表示“日常”和“日常生活”,而这个日常,主要指单调而平常。

本·海默尔对于“日常生活”的定义包括两个层面:浅表层面,“指的是那些人们司空见惯、反反复复出现的行为,那些旅客熙攘、摩肩接踵的旅途,那些人口稠密的空间,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天又一天”;从深层来看,“游客熙攘、摩肩接踵的旅途可能变成了百无聊赖这种沉重的负担,人口稠密的空间可能变成了一座监狱,而反复出现的行为可能变成了压制性的路线”。^①结合英语 run-of-the-mill 死循环、德语 alltag 工作日的千篇一律,以及法语 quotidien 单调,大致可以发现,在西方语言文化环境中,“日常生活”并非仅指字面意义上的每一天的生活,而是包含着一种对于现代工业社会中生活千篇一律、毫无生气的厌倦情绪。

这种厌倦情绪的爆发,正是二战后西方学界讨论“日常生活”的出发点。

(二) 日常生活研究与法国的战后反思

20世纪初,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提出“生活世界”一词,^②提倡从注重观察社会结构性问题,转向考察琐碎生活所包含的问题。换言之,以胡塞尔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厌倦了康德、孔德等人基于理性、形而上、科学主义的现代性思考,而更钟情于在细碎中寻找意义。这一转向,隐约地体现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思想界“世纪躁动”的影子。18世纪后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高速发展,至19世纪末,所谓的现代社会已经开始暴露出其内部所包含的悖论性成份。基于对这些悖论性成份的省思,哲学、社会学界开始反思现代社会。细言之,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上对现代社会的省思,又大致包括德、法两个不同的脉络。德国(包括北欧国家、意大利)由于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急于在现代性与民族话语之间寻找平衡,“神经质”式的表现主义更加受到青睐;而法国(包括西班牙)由于民族国家的建构早已完成,故此更加倾向于在浪漫主义式的现代性话语中发现存在的悖论。这些思考,往往被感性的、甚至非理性的艺术作品加以反映。无论是马蒂斯的画作《马蒂斯夫人》,还是斯特林堡的剧作《鬼魂奏鸣曲》,都透露出了厌烦宏大的现代性“元叙事”,注重省思生活的本质与意义的倾向。此后,受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相关研究短暂转入低谷,待二战结束后,19世纪末以来对现代社会的省思,开始不断发酵,形成所谓的“后现代”思潮。^③

由于多种原因,二战后法国思想界的左翼色彩比较明显,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传统,加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导致左翼力量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出发,反思法国现代社会。承接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取向,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原点,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在1946年出版专著《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关于日常生活理论的缘起背景,列斐伏尔在写于1980年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中作了解释,“当时,人们正沉浸在恢复自由后的乐观精神(希望和幻想)之中”。^④列斐伏尔提到的乐观,主要是二战结束、法国光复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但是,战争的结束并不代表现代社会固有问题的消灭,即便在战前,法国社会已然面临诸多顽疾,战争的结束只会加速被战争掩盖的顽疾的爆发。

① 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第4—5页。

② 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③ 有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问题的总括性讨论,参见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有关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问题,参见郑克鲁《总序》,郑克鲁、董衡巽主编《新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④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叶齐茂、倪晓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51页。

所谓的顽疾,哲学地来看,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受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影响,列斐伏尔得出了一个假设,“人们一般不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因此,提出日常生活理论是必需的”。^①在写于1956年的《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第二版的序言中,列斐伏尔明确指出,“《日常生活批判》完全是围绕异化理论而建立起来的”。^②异化理论,出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具体含义是: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③

马克思语境中的异化,主要指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其劳动以及劳动产品的异化。但是,列斐伏尔将这一观点作了内涵的延伸,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物质财富越丰富,精神空虚就越加重,生活的意义就越无从谈起,人类的日常生活已经脱离了前现代田园般的兴味盎然,其意义丧失在看似现代的城市景观之中。作为对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中,特别收入了一篇《一个周日在法国乡村写下的笔记》,文中列斐伏尔用文学化的笔调,描绘了前现代社会在乡村的某些残余,并将这种生活方式认定为更加有意义有趣味的生活。相比之下,城市中的现代生活,则完全暴露出 *quotidien* 所蕴含的单调乏味,甚至将人异化。

1961年,列斐伏尔出版《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后来在该书第三卷中,列氏回顾了前一卷的写作背景。思想层面上,自1946年至1960年间,“斯大林主义的巅峰,然后是斯大林主义的衰退,最后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尤其是在法国,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失败”。^④社会现实层面,“在1946—1961年,日常生活变化了——不是在展示日常生活掩藏着的富裕这个意义上,而是在相反的意义: 贫困、(市场等的)操纵、被动。那些年里,资本主义正处在征服新部门的过程中……最后,无独有偶,资本主义正在征服日常生活”。^⑤列斐伏尔的关注视角,正是法国在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左翼人士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观察。在法国左翼力量看来,战后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新的秩序,消费社会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异化。这种观察所得到的再思考,很大程度上导致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所展现出的社会问题,以及风暴本身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促使思想界从反思现代社会,跃迁到反思这种反思本身。在此背景下,米歇尔·德·塞托推出专著《日常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序言《研究的历史》中,鲁斯·贾尔提到,出版于1980年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写作动机是德·塞托对“1968年5月至9月间发生的‘事件’风暴进行了活生生的剖析”,“他辨认出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的开端,发现了子辈们合理的焦虑,无论是平凡的快乐还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

①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第561页。

②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叶齐茂、倪晓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7页。

④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第563页。

⑤ 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第565页。

都无法缓解这种焦虑”。^① 德·塞托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观察到无论是现代社会本身,还是针对现代社会的反思,其本身都带有浓重的焦虑情态。换句话说,在德塞托看来,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的城市景观象征着焦虑,这本身就是一种焦虑情绪。

透过法国哲学、社会学界有关的讨论,大致可以发现,日常生活研究所以关注日常生活,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深刻反思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焦虑,这种异化、焦虑,并非存在于史诗般的宏大叙事之中,而是渗透在生活的点滴之中。要省思、批判这种异化、焦虑,就必须回到“生活世界”中,以哲学、社会学的人本主义视角,透视现代社会隐藏在生活中的悖论性成分。

(三) 日常生活史研究与德国的战后反思

在法国哲学界、社会学界兴起日常生活批判的同时,德国史学界出现了名为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的史学流派。从词义来看,alltagsgeschichte指的就是工作日内的机械性日常活动。

根据德国史研究者 Geoff Eley 的观察,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常生活史范式开始在德国兴起。^② 对于这一流派,目前国内学界较有代表性的认识是刘新成结合 George G. Iggers 的专著《20世纪历史书写》形成的叙事脉络:

上个世纪后期,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十分活跃。一方面,高度工业化的社会机械运转将人们自由选择生活时空的“权利”碾得粉碎,日益增强的社会理性则严重抑制生活的创造性,以至自古以来人类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现代社会突然成为一个“问题”,因而引起关注和思考。另一方面,人们对福山的论断——“现代化标志着永恒福祉,历史将就此终结”——日益产生怀疑,同时对现代化的“代价”以及这一“代价”的承担者——既包括殖民地人民,也包括宗主国的“草芥之民”或非精英阶层——越来越倾注关怀和同情。^③

这一认识体现了从动机层面考察日常生活史范式的倾向。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西方”中,德国与法国所代表的研究取向的异同,上节讨论了日常生活研究的法国背景,本节将分析战后德国与日常生活史的兴起。

德国史研究者 Geoff Eley 将日常生活史的社会历史背景作了总结:德国新左翼势力的崛起,民族学认知路径被推崇,以及对法西斯主义的关注与反思。^④ 有关新左翼的问题,在讨论法国哲学界、社会学界的日常生活批判中已经作了讨论,这一点也为刘新成教授所揭示,在此不作深入分析,仅借用 Brad S. Gregory 对吕特专著《日常生活史:重建历史经验与生活道路》书评的观点。他认为,德国的 alltagsgeschichte 反映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左派社会历史学家研究视角的转变。通过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或衰落)使被边缘化的大众得到解放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政治体制、企业权力、技术

①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 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第4—5页。

② Geoff Eley, “Labor History, Social History, ‘Alltagsgeschichte’: Experience,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veryday—a New Direction for German Social Histor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61, No. 2 (Jun., 1989) p. 297.

③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Geoff Eley, “Labor History, Social History, ‘Alltagsgeschichte’: Experience,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veryday—a New Direction for German Social History?” pp. 315–319.

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似乎阻碍了对被压迫者的解放, 换句话说, 长期、大规模的进步导致囚禁而非解放。这一悖论促使社会历史学界开始反思以往的历史进程。^① 总的来看, 这一认识基本上是西欧左翼思想界的共识, 并未彰显德国的具体情势。要回答何为德国史学界日常生活史的独特背景, 则须聚焦于民族学认知路径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关注与反思。

由于德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迟至 19 世纪中期才完成, 紧接着的两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的参战都与德意志民族建构的尝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 在构建德意志民族的过程中, 过度的不恰当的工具理性, 导致了纳粹主义的诞生, 以及由此造成的种族屠杀问题。战后德国学界特别是民俗学界, 一直在反思这一问题。在德国民俗学家的访谈录中, 柯尼希认为战后德国民俗学研究具有双重责任, “管理纳粹时代的遗留, 同时也要清算这段历史”。^② 针对纳粹式的民族主义的反思, 催生了战后德国民俗学界针对现代“技术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反思与讨论。这类讨论以鲍辛格为代表, 跳出了对 volk 传统的执念, 回归对“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 亦即现代社会城市景观所含文化的考察,^③ 以期解释现代化进程为何, 又如何带来影响深远的历史包袱。

对纳粹以及传统民俗(民族)学的批判, 深刻影响了史学界。根据 Geoff Eley 的观察, 20 世纪 70 年代, 德国民众对于希特勒、纳粹开始大规模的反思, 大量回忆性作品先后问世。对“民族国家”的省思明显为保守政党所利用, 左翼政党也通过各种渠道参与历史讨论的洪流。对此, Geoff Eley 指出, “日常生活史有明确的政治背景”。^④ 在解释何为日常生活史时, 日常生活史的主要提倡者吕特专门指出, “对于纳粹主义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或许能进一步表明, 这种观点可能首先适用于 20 世纪独裁体制的分析, 以发现‘横亘’在社会与统治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性”。^⑤

由于动机上附加了反思现代性及其产物——纳粹的包袱, 德国史学界的日常生活史研究, 不得不从造成纳粹在德国风靡一时的社会根源因素——德国民众入手。吕特在其题为《何为日常生活史? 谁来书写日常生活史》的文章中概述了 Alltagsgeschichte 的几个特征。第一, 日常生活研究侧重于普通人的质性体验; 第二, 该方法将历史演进视作普通人动态实践的产物, 而非抽象的国家或市场所施加的非个人结构或力量; 第三, 这种观点强调了从底层视角所观察到的现代社会所谓进步、理性和解放的成本。^⑥ 如果点破这一学理的总结, 其核心感情倾向基本上可以被解释为“为何德国民众选择了纳粹?(而非传统研究中所认为的纳粹如何控制了德国民众)”, 具体到日常生活史, 就是“宏大进程”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小世界”中被实践。^⑦ 在此基础上,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将纳粹问题归入了现代性所固有的弊病之中, 认为纳粹主义就是现代性本身“病态”和“矛盾”的产物。^⑧

① Brad S. Gregory, “Is Small Beautiful?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8, No. 1, 1999, p. 100.

② 赫尔曼·鲍辛格等《日常生活的启蒙者》吴秀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65 页。

③ 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 卢晓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④ Geoff Eley, “Labor History, Social History, ‘Alltagsgeschichte’: Experience,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Everyday—a New Direction for German Social History?”, Vol. 61, No. 2 (Jun., 1989) p. 299.

⑤ 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第 3 页。

⑥ Brad S. Gregory, “Is Small Beautiful? Micro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8, No. 1, 1999, p. 101.

⑦ David F. Crew, “Alltagsgeschichte: A New Social History ‘From below’?”,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2, No. 3/4, (Sep. – Dec., 1989), pp. 395 – 396.

⑧ David F. Crew, “Alltagsgeschichte: A New Social History ‘From below’?”,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ol. 22, No. 3/4, (Sep. – Dec., 1989), p. 404.

透过这一动机来看,讨论下层民众并非研究日常生活史的目的,而仅仅只是手段。吕特本人也强调,“‘日常生活史’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观点,而不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对象。相反,所谓‘小人物的历史’的说法虽然提出了重要视角,却局限于社会的一部分”。相比于“小人物的历史”,吕特认为“下层历史”较为贴切,认为“它指出了一种视野转换,即不再从‘关键部门’的视野出发,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实践的过程”。^①在这里,下层显然不只指代“小人物”,而是所有“非关键部门”,正是由于非关键部门的群体性倾向,才会诱发“宏大进程”。

基于上述反思,德国的日常生活史更关注“主体性和经验,强调意义的社会生产和建构”。^②回看日常生活史的主要倡导人吕特主编的专著《日常生活史:重建历史经验与生活道路》所收录的各篇专论,无论是对工人生活的关注,^③还是对工人文化的讨论,^④抑或是对工人经验与德国法西斯关系的反思,^⑤虽然具体问题不尽相同,但其研究动机都围绕着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问题,探究工业文明中的人——工人的日常生活所体现的意义。这一点,深刻体现了德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现代性反思动机。

通过对二战后以法、德为代表的欧洲哲学、社会学、史学界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社会背景和研究动机的回顾,大致可以看出一条隐约可见的主线:现代性/现代社会批判。所谓现代性,在哲学层面基本上源自康德的理性主义,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衍生出“世俗趣味、工具理性和个人表现”三个取向。^⑥随着思想层面现代性的演进,以工业化、资本主义为特点的现代社会也高歌猛进。然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或巨或微的现象,都迫使学界反思现代性/现代社会。在这一背景下,出于对“现代”的省思,二战后出现了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与讨论,至于关注生活、关注民众,更多的是手段而非目的。故此,甩开现代性反思而讨论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很容易出现忽略动机、纠结对象/方法的问题。

二、实践反思: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问题脉络

(一) 日常生活史的中国史学史背景

相比以德法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社会学、史学界所处的现代性反思的学术脉络,中国史学界在讨论日常生活史时有着基于本土问题的研究动机源流,这一源流的主线即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范式的鼎革与创新。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导,以经济基础为前提的史学研究”的大规模反思,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史学危机”。^⑦1986年后,以中国近代史学科为代表,中国社会史

① 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第1页。

② Geoff Eley, “Foreword”, in Alf Lu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ix.

③ Harald Dehne, “Have We Come Any Closer to Alltag? Everyday Reality and Workers’ Lives as an Object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in Alf Lu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p. 116 – 148.

④ Wolfgang Kaschuba, “Popular Culture and Workers’ Culture as Symbolic Orders: Comments on the Debate About the History of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in Alf Lu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p. 169 – 197.

⑤ Alf Ludtke, “What Happened to the ‘Fiery Red Glow’? Workers’ Experiences and German Fascism”, in Alf Ludtke, ed.,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Ways of Life*, pp. 198 – 251.

⑥ 参见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⑦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

研究开始蓬勃发展。但是,社会史的初步讨论,由于某些惯性因素,很多还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史。此外,由于过快引入社会科学范式,特别是社会学理论体系,社会史的研究出现了被称为“近代社会史学科建构的社会学化”的问题,亦即将社会史研究机械地理解为“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意识”这“三板块”。^①这一问题的出现,与人文学科研究一定程度上的理论焦虑有关。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冲击下,传统以叙述、考证为主,相对更重视“求真”的史学研究方法,开始不能满足学界对中国史研究“求解”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引介西方史学范式,成为解决理论焦虑的重要途径。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开始被译介到内地。^②基于对之前经济社会史研究重量化考察、重结构分析的反思,新文化史范式以其重质性讨论、重叙事技巧、重个案研究、重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形式上更加灵活、方法上更加多元,很快吸引了学界的注意。由于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余温尚在,学界很容易将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式与“文化热”中的“泛文化”倾向相联结,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大量尝试从文化层面解释历史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国内新文化史范式的发展,与史学史脉络下省思传统经济社会史、解决理论焦虑的研究动机有很大关系。

然而,因为对新文化史范式的过度解读和利用,出现了史学研究中的“泛文化取向”,并间接导致了“碎片化”的问题。由于新文化史强调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观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是实践中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一旦所有事物的解释都被归结于文化时,原本能够解释一切的工具就很有可能失去其解释力。更进一步来说,新文化史所倡导的微观史,或多或少地鼓励了从边缘入手、从细节入手的实践取向。但是,并非所有水滴都能映到阳光,一些研究很容易就变成了猎奇,而忽视了研究对象的意义。由此,学界开始集中反思“泛文化取向”和“碎片化”问题。

稍晚于新文化史的译介,2004年,刘新成在《史学理论研究》发文,介绍西方日常生活史研究。作者认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特色包括研究范围微观化、“目光向下”、研究内容包罗万象、重建全面史、“他者”立场的解释、拓宽史料来源等。^③除了研究范围微观化、目光向下等同样为新文化史所提倡的取向外,强调日常生活史有重建全面史的特点,隐含了某种对研究对象过于细碎的警惕。从其后的发展历程来看,日常生活史范式的引进与发展,呼应了由于过度套用新文化史理论,而出现研究对象碎片化、研究意义空心化的焦虑。日常生活史“总体史”“以人为核心”的愿景,探求生活意义的研究动机,正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研究对象碎片化、研究意义空心化的问题。

与中国史学界新文化史略先于日常生活史范式不同,西方新文化史的出现稍晚于日常生活史,诞生于20世纪70—80年代的美、法两国。根据新文化史旗手之一的林·亨特的总结,新文化史植根于西方史学界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④可以看到,新文化史所植根的问题意识,主要承

① 王先明《社会学化、范式说以及多元化趋势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0月15日。

② 如1999年,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赴复旦大学讲学,专门举办了以新文化史为题的讲座。系统介绍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参见周兵《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

③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与西欧中世纪日常生活》,《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Victoria E. Bonnell &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e Tur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ix. 所谓“语言学转向”源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学生整理其讲义而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首版1916年),该书提出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在哲学界引起广泛讨论。其后,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理论,进一步将语言从固定的表意工具,变成依存于共同文化背景的规则。在语言哲学观点中,历史研究的根基——“史料”,从忠实反映历史的载体,变成了可以透过文化阐释加以解读的研究对象。此外,战后文化人类学研究,注重考查文本、仪式等符号、象征性对象的考察,强调从文化脉络中理解“异文化”的思路,与历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也不无关系。

接20世纪以来对语言、文化等象征性对象的研究,其背后的省思,已经远不仅仅是西方现代性或现代社会,而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与德国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相比,美法两国新文化史研究的动机,已经看不到根植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焦虑,研究者更多的是在兴味盎然地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或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剖析一个异质文化的独特文本或仪式。

由于译介时对于各种研究范式历时性、研究动机的淡化,原本有承接关系的日常生活史和新文化史,有时被视作相辅相成的研究思路。与新文化史早在21世纪的最初十年就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同,日常生活史被置于聚光灯下,更多的是2010年后的事情。站在21世纪20年代的开端,回过头来考察日常生活史在国内学界受到重视,可以发现其很大程度上是对新文化史“泛文化”“碎片化”倾向的“反动”。

(二) 基于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综述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梳理国内学界对于日常生活史范式的讨论,廓清国内日常生活史如何试图鼎革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在此特别聚焦2010年后几篇有代表性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综述。之所以将时间下限定在2010年,主要因为该时间点后,国内学界开始集中审视省思新文化史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并开始思考以日常生活史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而关注研究综述的原因,在于撰写综述的过程,正是反思先行研究,将实践上升到理论认识的过程。

2010年,胡悦晗、谢永栋撰文认为,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经历了民族风俗志式描述、经济—社会史研究、新经济社会史研究,以及新文化史及学科交叉影响下走向独立化与多元化研究四个发展阶段。^①这四个阶段的划分,也基本上可以视作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而最后走向独立与多元化的研究,则可以看作日常生活史的某种理论自觉。对于日常生活史未来的发展方向,作者认为,目前学界讨论日常生活史出现了由于“眼光向下”导致的琐碎叙事,甚而“沦为诠释社会理论的注脚”。为了超越这一瓶颈,作者认为需要建立“眼光向上”的取向,关注知识分子问题,并拓宽城乡比较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②

进入2010年代后,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为代表,中国史学界开始更加自觉地关注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实践。中心的多位学者先后撰文,梳理中国史学界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实践。

相关综述都关注了日常生活作为哲学命题的面向,也论述了德国日常生活史学派的先行研究,指出日常生活史作为“后现代思潮中兴起的史学流派”,其对“现代社会强烈的批判倾向不容忽视”,强调“通过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关照来省思‘现代性’以及人类文明的走向”。^③具体来说,相关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什么是日常生活史,其与社会生活史有何区别;二是如何展开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如何避免史学研究“碎片化”。

常建华将日常生活史与生活史两词互用,认为“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有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研究方法上从物质文化消费进入生活史研究……”^④生活、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如何做一个清晰的界定,作者强调,社会生活史研究“多为生活内容、样式的考察”,而日常生活史则应“揭示日常生活背后的逻辑与意义”。^⑤

① 胡悦晗、谢永栋《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史林》2010年第5期。

② 胡悦晗、谢永栋《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史林》2010年第5期。

③ 余新忠、郝晓丽《在具象而个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④ 常建华《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⑤ 常建华《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余新忠、郝晓丽也专门讨论了日常生活史与社会生活史的区别,认为日常生活史相对于社会生活史,主要关注的是“一定时空中具体的个人”,并在研究方法上围绕个人,展开“全面史”的研究,故而在研究中,需要“更在意一定时空中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感受”。^① 闫爱民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并认为社会生活史更注重“公共性”而轻视“个体性”。^②

李金铮提出了“严格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这些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的成果,包括陈蕴茜、卢汉超、王笛、朱小田、连玲玲、黄克武、湛晓白、曹南屏等人的成果。^③ 细究这些学者的成果,虽然考察对象、考察方法上各有不同,但是在研究出发点上,大致都是基于理论关怀。此外,李金铮特别指出,“日常生活是人类尤其是普通民众惯常的经历和感受”。^④ 这一定义,相比于“下层”“微观”的对象式定义,有了很大突破,给与研究对象以主体性,更重要的是,关注了日常生活史背后所承载的“经历、感受”等感性层面的内容。

关于如何克服碎片化的问题,夏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基于魏晋南北朝日常生活史的先行研究,他认为,由于史料的相对零散,“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至少在当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⑤ 故而可行的研究范式是“片段记忆整合”与“以人为核心”,进一步来说,“应当有更深一层的理论关怀,更重要的是要触及社会历史发展变迁的宏大问题,探讨人的日常行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意义”。^⑥ 他强调以人为核心的研究取向、关注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提供了以人为中心,整合片段式记忆、避免“碎片化”的研究路径。

前述几位学者都提出重建“全面史”、避免单纯“眼光向下”以致“碎片化”,以及重视人的意义和日常生活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过度借用新文化史范式的反思。由于过分强调眼光向下、微观史、讲故事(叙事技巧),一些研究出现了研究对象的“碎片化”和研究意义的空心化。超越新文化史“眼光向下”“琐碎叙事”“研究意义缺失”的倾向,可以被视作国内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动机之一。

(三) 几部中国日常生活史著作的动机分析

如前所述,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人本关怀的现代性/现代社会反思。探究现代性焦虑之下,人的意义如何在现代社会展现,现代社会与人的关系究竟若何,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动机。目下海内外学界对于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已经推出多部颇具分量的著作。这些著作背后,有着怎样的研究动机,人与现代社会关系的反思,又被怎样讨论,值得深入分析。

宋代以后的中国史,受日本学界观点的影响,经常被划入“近世史”的范畴,其特点即是唐宋变革后所形成的某些类似于现代社会的因素。正是由于这种似有若无的“现代性”,宋代,特别是南宋成为了海外学者讨论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对象,其中的代表作是谢和耐初版于1962年的专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在该书的导言中,谢氏毫不隐晦对于南宋南方城市的关注,“在南方,人口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海上和内河交通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不为中国北方所熟悉的特殊

① 余新忠、郝晓丽《在具象而个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清代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② 闫爱民《20世纪以来的秦汉日常生活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5期。

③ 李金铮《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

④ 李金铮《众生相: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

⑤ 夏炎《范式引导与记忆整合:魏晋南北朝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9卷)第193页。

⑥ 夏炎《范式引导与记忆整合:魏晋南北朝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9卷)第171页。

的城市生活方式”。^①在这里,“城市生活”四字应该引起极大警惕,因为对于现代社会城市景观的反思,正是西方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史的讨论动机之一。谢氏全书,用笔基本上集中在南宋临安城日常生活的各面向,但使用的标题却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通观全书,蒙元全不存在,但又处处存在,这一点为译者刘东所观察到,认为这种春秋笔法,正是“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②

在书尾,谢氏以文学化的笔触写道“我们所描绘的中国人的形象看上去是如此的人性,连同其全部矛盾和放纵一起,都是如此的贴近我们,如此的似曾相识,以至于我们简直被引得要忘掉一切把他们与我们区分开来的东西了。”^③谢氏当然不会忘掉20世纪法国与11世纪临安之间的天壤之别,临安也不能代表整个南宋。然而,谢氏把全部笔墨集中在临安城近乎于“现代”的日常生活之上,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推出一个令人唏嘘的结论性描述“在中国早已开始了近代化时期,是蒙古人的入侵阻断了此一迅速进步的过程。”^④借由这个论断,大致可以窥见谢氏的创作动机,至少是超越学术理性的动机部分:因为反思现代社会,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现代社会”的影子,又为那一点点“现代性”被扼杀而惋惜。借由这个动机,再回看序言中提到的“城市生活”,篇章结构中被置于第一章的“城市”,就不难理解了。

相比于谢和耐“西人看东土”华裔学者卢汉超的专著《霓虹灯外》,关注的则是真正的中国现代社会,即现代城市生活。在该书的导论中,专门提到了讨论“城乡关系”“城市和近代化,商业文明的构建”,以及重塑“中国中心论”的愿望。^⑤从城乡关系到城市和近代化,再到商业文明,最后归结到重塑中国中心论,一步踏着一部,从城市这一研究对象,跃迁到了改变中国中心论的研究动机上来。学界围绕中国中心论的讨论,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中国中心论是否真的超越了“冲击—反应模式”所携带的殖民主义色彩,并试图在推敲中国中心论的过程中,把中国(东方)真正作为叙述的主题。换言之,就是在不断摆脱早期现代社会某种“文明社会”的高傲。作为在中国接受学术训练并在美国深造的历史学者,卢汉超通过讨论近代上海城市生活的本土元素,如棚户区、石库门,力图在西方的现代性叙事之外,讨论某种中国本土的城市现代性。

2018年,胡悦晗出版专著《日常生活的逻辑》。在书中,作者明确其观察的是城市知识人的生活逻辑问题,具体来说,是在日常生活中城市知识人如何进行阶层及身份认同建构。^⑥很多时候不是阶层诞生文化,而是文化塑造阶层,这种文化主义视角下阶层被塑造的观点,自汤普森的专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问世以来,一直备受推崇。但是,如果反思这种文化建构阶层的模式则会发现,将原本被当做先验存在的阶层、身份,视作后天的赋予,其背后正是现代社会日常生活所导致的身分认同迷茫。在日复一日的无意义下,很容易产生“我是谁”的迷茫,故而需要努力建构自我的身份、建构阶层的群像。在现代性反思下,单纯的文化塑造阶层同样可能也是一种神话,人的阶层与身份应有着更加多元的样貌。

在氏著绪论的开头,作者专门引用了一篇感叹“美好时光不再回返”的怀旧抒情散文,引出某种

①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刘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② 刘东《译后絮语》,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第248页。

③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第242页。

④ 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第7页。

⑤ 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⑥ 胡悦晗《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对于民国城市生活的情结,继而又将知识人视作民国城市的一个景观,展示了城市与人互动的研究视角。在这一被明确点出的情怀关照下,氏著没有仅仅停留在文化塑造阶层的线性叙事,而是刻画了城市日常生活中穿梭于建构身份与自我认同间的知识人群像。从针对知识人身份、阶层建构的考察,到对民国城市的怀旧,可以凝练出一个若隐若现的动机:现代城市景观的快速发展,使把握城市生活的恒常变成了一种奢望,故而需要回到被视作有“怀旧情结”的民国上海,把握一种凝缩在文献中的样貌,寻求某种知识人身份的共情认同。

近些年来日常生活史“严格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史”^①在国内受到重视,可以看作对新文化史的某种“反动”。在讨论综述文章与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在史学史的脉络中,国内日常生活史研究正在致力于克服由于过度使用新文化史范式所带来的问题。学界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基本共识,是日常生活史将不再片面强调“眼光向下”“微观史”“文化转向”等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而是从关注人的感受、经验,探寻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意义出发,带着对现代性和现代社会反思与人本主义关怀来审视历史,更重视研究的动机、研究的视角。

三、现实对话: 21 世纪以来的日常生活与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动机

(一) 21 世纪以来的日常生活变革与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现实关怀

梳理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变化,可以发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了颇异于前的图景。

阎云翔 1997 年在黑龙江省下岫村所做的田野调查中记录到,一名 74 岁的老者认为村内过去 50 年最重要的变化包括两点:“爷爷变孙子”和“妇女上了天”。^② 这位老者的评价,从感性体验的角度反映了代际间、性别间固有模式的剧变,其最重要的特点是金字塔式的社会关系结构、差序的人际关系结构,都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这一点在出生于 1980 年后的青年人及其与父辈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

进入 21 世纪 10 年代,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社会经济进入了“新常态”。^③ 经济学者李建民从经济与人口的关系出发,阐述了中国人口的“新常态”:

一是人口增长率处于 5‰ 左右的低水平,并在本世纪 30 年代末转为负增长;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比开始提高;三是人口老龄化加速,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四是人口素质显著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五是人口城乡分布格局改变,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④

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的变迁,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更加容易体验到日常生活的焦虑与不安。在物资贫乏时代,由于温饱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人的意义、日常生活的意义等问题无暇被顾及。随着

① 李金铮《众生相: 民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安徽史学》2015 年第 3 期。

②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龚晓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4 页。

③ 《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新华网 2014 年 11 月 9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11/09/c_1113175964.htm[2020-04-13]

④ 李建民《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人口研究》2015 年第 1 期。

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高速发展,在隔断办公间中的日常生活有何意义,开始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2015年河南某中学教师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为由的辞职信引起社会热烈讨论。人民网的评论指出:

宏大的语境渐渐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为民族之崛起而读书、工作、献身,为国家富强而争分夺秒、日以继夜,对于芸芸众生,已经丧失了特定的语境。随着经济发展,极端的物资贫乏也只剩其为越来越少人的遥远记忆。为了更好的工钱而不管不顾,一定要奋斗成为“地主老财”、“大资本家”,越来越多人也不认同。^①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只是一枚螺丝钉,刻刻都不停地运转,为了机器的运转而不断作出牺牲,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青年一代人很容易发问“机器运转的意义何在呢?”^②

与之类似的是,近些年来网络上出现一类“自由体”网文,大致内容为某一商品价格过高,使消费者不能随意购买,进而伤害消费者的“自由”。有评论指出:

无论是“香椿自由”还是“荔枝自由”,除了一些媒体喜欢仿造“自由体”“史上最牛体”的渲染之外,无非是客观上制造个人不能随心所欲的社会焦虑。^③

仅仅因为荔枝价格受季节性因素影响上升,就产生消费自由被剥夺,甚至“个人不能随心所欲的社会焦虑”。在此话语体系中,人的意义似乎只体现在消费上,如何达到消费的最大化,就成为人的意义的最重要体现。“自由体”所展现的焦虑,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样,展现了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对于日常生活意义、人的意义的焦虑与探寻。在此背景下,一些通俗读物,以及网络上大量出现的“心灵鸡汤”“成功学”,部分地回应了社会的关切。但是,这些通俗读物只是对“何为人”“何以为人”“为何为人”等问题的模糊思考,其中一些内容还有着庸俗、低级的一面。

在此背景下,公众开始自觉地从历史上的日常生活出发,探寻人的意义与日常生活的意义。所谓的“清宫热”“民国热”,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回应大众对于人与日常生活意义的关切。通过观看、阅读各类媒体上所演绎古代或近代日常生活图景,观众、读者消解了部分针对现实日常生活的焦虑。然而,应该看到,目前大众传媒中对于日常生活史的讨论,主要以通俗作品居多,水平也良莠不齐。随着观众、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严谨的、扎实的日常生活史将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需要。

爱德华·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④进言之,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过往,而历史学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在当前社会背景影响下,针对历史问题的理性讨论。有学者指出,美国“中国学”研究之所以能不断出新,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带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特性,“能够提出一些切中肯綮的与现实社会

① 许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何以诱人?》,人民网2015年4月15日。<http://www.opinion.people.com.cn/n/2015/0415/c1003-26849977.html> [2020-04-13]

② 许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何以诱人?》,人民网2015年4月15日。<http://www.opinion.people.com.cn/n/2015/0415/c1003-26849977.html> [2020-04-13]

③ 巴扎黑《“自由体”是夸大其词兜售社会焦虑》,《南京日报》2019年5月20日。

④ E. H. 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5页。

息相关的重要问题”。^①中国当代日常生活的变革,正是日常生活史研究所不能逃避的社会背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推进,从动机上来说不应绕开当下日常生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有关“人”的焦虑究竟源于何时、人的意义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似应是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在现实关怀脉络中的动机。

(二) 当代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史学史动机

讨论、研究日常生活史,除了重视其现实关怀动机之外,还应注意其在中国史学史脉络上的动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经历了问题意识的多次变换:研究对象上,从宏大的政治史叙事,到经济社会的结构,再到“个人”“区域”“下层”;方法论上则先后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比于给出概括性叙述,学界越来越倾向于透过某个具体对象(人、事件、物、空间等)来探讨历史背景与具体问题间的互动。当然,这一趋向间接地导致了“碎片化”的问题。

2012年,《近代史研究》第4、5期连续刊发笔谈,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总的来说,学界认为“碎片化”是当下史学研究不可避免的现象,唯有正确认识,才有可能加以超越。由于过度借用新文化史范式,一些研究片面从细节、边缘寻找话题,但往往又不能与学界主流话题做学术对话,故而形成为细节而细节、为边缘而边缘的琐碎研究。区域史的研究原本是超越政区划界的经济社会史范式,然而,过度强调区域,无限制地细分区域,忽视区域与整体间的联系,导致出现一些地方志式的细碎研究。进言之,细究“碎片化”的缘起,与没有廓清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脉络,忽视每一种史学范式的研究动机,片面套用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而置原有研究的宏大叙事理路于不顾有很大关系。

2010年后,日常生活史研究热度不断上升,对于此前研究的反思,正是史学史脉络中的研究动机。细言之,就是在此前研究成果之上,更加全面地把握历史中人的境遇,理性与感性、下层与上层、地方与中央、私人与国家/社会、性别、年龄等层面,都置于日常生活的情境之下加以考察。与经济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相比,日常生活史似乎更难提炼出“整体”的研究对象,日常生活的重复与琐碎,看似更有可能加剧“碎片化”的问题。然而,基于上文所分析的日常生活史的实践与理论反思,可以看到学界已经不再将日常生活视作一个自成一体的研究领域,而是基于在此前研究所得到的众多“碎片”认识下,总体性审视历史的视角。换言之,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的成果,正是基于事件、结构、物质、文化的充分讨论,激发了学者从人出发,全景式审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境遇与经历的兴趣。

此外,不同代际之间问题意识和研究动机的差异,特别是青年学人的成长背景,也是他们研究日常生活史的独特动机。近年来,生于1980年后,在21世纪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人,开始大量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相比于前辈学者对宏大问题的关注,青年一辈学者相对来说有着其独特的问题意识。由于更早地接受了多学科交叉的学术训练,青年学人对于日常生活体验及与历史语境的共情表现出深厚的兴趣。

从目前的研究趋向来看,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史学史动机,有着其独特的样貌,具体来说,包括文学式的激情,以及哲学式的人本主义关怀。

史学研究毫无疑问是严谨而理性的实践,但无论研究主体还是客体都是活生生的人,人不可能

^① 杨华《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时时处处保持绝对理性。感性的体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感性实践,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性状。然而,感性体验与实践本身难以作为客观实体被把握,社会生活史研究所以会“见物不见人”,很大程度上与致力于把握客观实体的研究取向有关。所谓文学式的激情,并非必须要使用文学作品为史料,也不一定以文学的笔触书写历史,而是以文学式的激情,承认感性因素、理解感性因素,进而尽可能地把握感性因素。适当的时候使用文学式的表达,以感性感知感性,以感性表达感性。

哲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就是讨论人的问题,一切从人出发,讨论“为何人”“何以为人”“为何为人”等话题。然而,由于自然科学范式的影响,目下史学研究中,在“人”的问题上存在着重讨论“为何人”“如何为人”等描述性的、易于理性把握的问题。细言之,所谓“为何人”,强调历史评价,一切从被量化的人物历史功过、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出发,试图给人一个历史地位。所谓“如何为人”,倾向于描述式地勾勒具体历史时期人的活动轨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乃至想了什么,都被放在一个大体可以被线性的叙述逻辑中加以呈现。应该看到,“为何人”“如何为人”的讨论,提供了扎实的先行研究成果。日常生活史实践的展开,必须保有哲学式的人本主义关怀。具体而言,就是关注人如何成为人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往往在不经意间形塑、表达自我,给定自身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对位置。关注这一问题,不在于准确找出这一相对位置,更不在于回答具体的哲学命题,而是保证能够不偏离感知人这一基点。

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正是现实关怀和史学史两个脉络动机的交汇。细言之,从史学史的脉络来说,虽然西方史学界的日常生活史早于新文化史,但是在中国史学界,日常生活史可以被视为社会史革命、新文化史革命这一“新史学”脉络下的又一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动机,就是要克服社会经济史的经济决定论,以及新文化史的“泛文化”“碎片化”问题。从现实关怀的脉络来说,日常生活史是客观理性地审视日常生活的变革、回应社会对于生活意义的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研究中国日常生活史,更加不能忽视与当今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对话,既透过历史审视当下,也借由当下理解历史。

(作者李小东,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300350)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凯)

SUMMARY OF ARTICLES

Sequels to *Philosophy for the Masses*: On Ai Siqi's Textbook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Early PRC Years // Du Tao

In the campaigns to popularize Marxism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 1955), Ai Siqi established a philological system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at was accessible to ordinary people, and he applied this system to history and, using it, explained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i's system was adopted by a good number of textbook edition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became popular in the whole nation. These textbook edi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of development, before 1953 and those after. Speaking to the need to build New Democracy, these textbooks of the first stage adopted the paradigm of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dominant theme. By contrast, those of the second stage adopted the paradigm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meet the need in transition to the socialist society. In spite of different paradigms, the two stages share the same popular style, and they can be regarded as sequels to *Philosophy for the Masses*. These editions of textbook are the valuable material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 Reflection on Theory and Practice: Why Do We Study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 Li Xiaodong

“Why do we study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To discuss this question, it helps to explain the internal logic of life as a paradigm in historical studies with regard to the research motivation. In reflecting upon the paradox of modernity faced by Western societ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study of everyday life has appeared in Western academia represented by a trend in French philosophy,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in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Alltagsgeschichte) in German historiography. Out of different theoretical concerns, new cultural history and everyday life history as research paradigms hav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West. In the early twentieth-first century, the paradigm of everyday life history was introduced into mainland China via translation. Its “human centered” approach and “holistic view” speak to the growing need to overcome the fallacies of “cultural essentialism” and “fragmentatio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s the everyday life of Chinese people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now, the public need to think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everyday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is welcome in China, also becaus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hinese history calls for 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in this area.

From Understanding Culture to Appreciating Feelings: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China // Han Xiaoli

It has been more than 30 years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China. As the product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is field has gained the consciousness of reflection and reference from the beginning. Researchers have shifted their approaches in historical inquiries from the (re-) positioning of culture, to the deep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and then to the appreciation of ordinary people's feeling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y have reflected upon traditional cultural history, absorbed and learned from the achievements of social history and New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West. By doing so, scholars have accomplished the innovation of theoretical methods and the shift of